

# 袁枚批评浙派

王英志

(苏州大学出版社,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袁枚以其“性灵说”为准绳,对清代康乾浙派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皆有评论,对其与“性灵说”符合之处予以肯定,对不符合“性灵说”之处则予以批评。其目的是为倡导“性灵说”扫除障碍。

**【关键词】**袁枚; 浙派; 性灵说; 朱彝尊; 查慎行; 厉鹗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3-0043-06

袁枚既是诗学理论家,又是诗学批评家。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袁枚以其“性灵说”理论作为褒贬其他诗学的依据<sup>①</sup>,又以其诗学批评实践扫除倡导“性灵说”诗论的障碍。袁枚的诗学批评范围甚广,自《诗经》至当代皆有所涉猎。但其主要笔墨是花在清代康乾诗坛的主要批评对象上,对此,《随园诗话》卷五曾有明确、全面的揭示:“抱杜韩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之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古董开店。”[1](p.143)“贫贱骄人”是指学唐王孟的神韵派王士禛,“权门托足”“木偶演戏”是指仿唐李杜的格调派沈德潜,“古董开店”是指以考据为诗的肌理派翁方纲,而“走宋人冷径”则是指学宋的浙派厉鹗。袁枚对浙派的批评除厉鹗外,还涉及朱彝尊与查慎行。袁枚于各派代表的态度是不同的,或贬多褒少,或褒多贬少,或只贬不褒,或只褒不贬。与批评其他诗派相比,袁枚对浙派褒多贬少。这全视批评对象的诗学是否有利于“性灵说”的发扬,是否有利于诗歌的发展。其批评大体是公正准确的。

## 一、批评朱彝尊

浙派是清代康乾诗坛宗宋的诗派,与崇唐之王孟的神韵派王士禛及崇唐之李杜的格调派沈德潜审美趋向自然不同。浙派代表人物为厉鹗,但其创始人为朱彝尊,承继者查慎行又发展之,至厉鹗乃形成独特风格,袁枚对于浙派这三个重要人物皆有评价,而于厉鹗用力尤多。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金风亭长等,嘉兴(今属浙江)人。他于康熙诗坛与王士禛齐名,有“南朱北王”之称,分别为南北两大宗师,又同属国朝六大家(其余四家为施闰章、宋琬、查慎行、赵执信)。朱氏于诗学基本上是崇尚唐诗,《王学士西征草序》称“学诗者

**【收稿日期】** 2001-09-20

**【作者简介】** 王英志(1944-),男,吉林长春人,苏州大学出版社编审,中文系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诗学研究。

<sup>①</sup> 笔者将袁枚“性灵说”涵义概括为:其理论核心或主旨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造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等所寄寓的诗歌意象要灵活、新鲜、生动、风趣;诗歌作品宜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艺术观点。

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又主张性情与学问并重,《斋中读书十二首》其十一认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故以醇雅为诗歌极致。其为诗语不雅驯者勿道,句酌字斟,务归典雅。朱彝尊这一诗学思想对厉鹗深有影响,但遭到袁枚的批评。朱彝尊晚年开始改变鄙薄宋诗的态度,洪亮吉称其“晚宗北宋”[2](p.21)。故朱彝尊是国朝六大家中开诗学宋之风气者,从而被视为宗宋之浙派的开山祖师。

朱彝尊在袁枚心目中的地位与“一代正宗”王士禛并重,故《莺脰湖庄诗集序》有“或者伤国朝诸老,倏忽代谢。竹垞南海,阮亭北逝”[3](p.8)之语,并称“朱竹垞先生诗名盖世,而自称本朝第二……前辈之虚心如此”[1](p.249)。但袁枚于朱氏诗学理论未加批评,这或许与朱氏诗学理论未成系统,不如王士禛“神韵说”影响深广有关。袁枚对朱彝尊感兴趣的是其有利于自己倡导主情之“性灵说”的诗作,而采取类似“狐假虎威”的策略。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五言排律《风怀二百韵》,乃是一首情诗。朱氏《静志居诗话》自称“盖感知己之深,不禁长言之也”。此“知己”据陈衍《石遗室诗话》云“相传为其小姨”[4](p.2729),小姨姓冯名寿常,字静志,尝依姐居,邹弢《三借庐笔谈》云其“灵心慧质,善谑能吟。居久,(与朱氏)因目成焉。夫人知之,促妹归嫁”[4](p.2731)。冯寿常所嫁是吴门“乡里多田足谷之子”,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诚不惬聪慧女郎之素心也”。冯氏嫁后不久丈夫去世,冯氏与朱氏复有交往。后因朱氏赴云中(今山西大同)远游,冯氏积思成疾,终撒手人寰。朱氏倦游而返,见“物换星移,风微人往,随处感触,无限哀悼”(见姚大荣《风怀诗本事表微》)[4](pp.2731-2740)而作《风怀二百韵》,追思与冯氏相知相爱之经过。此诗颇悖于封建伦理道德,据吴騞《拜经楼诗话》,朱氏“晚年刻集,屡欲汰之,终未能割爱”[4](p.2798),可见其对冯氏感情之深。朱氏此诗自然为道学家所不齿,而袁枚却极为赞赏,大作文章。乾隆十八年(1753)曾作《题竹垞〈风怀〉诗后有序》云:

竹垞晚年自订诗集,不删《风怀》一首,曰:“宁不食两虎特豚耳。”此竟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颇滥,盖有名行无考,附会性理数言,遽与程、朱并列。竹垞耻之,托词自免,意盖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删此诗,其果可以厕两虎乎?亦未必然矣!

尼山道大与天侔,两虎人宜绝顶收。

争奈升堂察也在,楚狂行矣不回头! [5](p.177)

朱彝尊不食孔庙之冷猪肉之语乃是一种态度,即不肯于诗集中删除《风怀》一诗,耻于与程、朱理学大师为伍。不管朱氏思想观念如何,仅从这点看,堪称是反“性理”的行为。而袁枚诗以“楚狂”喻朱氏,典出《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子“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其“行矣不回头”之决绝,是不与“程、朱并列”的生动表现。朱氏之举引起理学家的不满。如朱石君尚书即因朱氏“不删《风怀二百韵》,以为恨事,至于痛哭流涕”,袁枚大“不以为然”,认为此“即昌黎之不删《三上宰相书》,所以存其真也”[6](p.184)。真性情确是《风怀二百韵》之本质特征。此外,袁枚于《答戴园论诗书》中再次提及“竹垞存《风怀》一首”,不“贪后世尊崇”之事。袁枚之所以再三称道朱氏不删《风怀》诗,是因理学家程戴园“来谕谆谆教删集内缘情之作,云‘以君之才学,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袁枚主张“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其缘情之作正属“必不可朽之诗”,是“虽贱而真”之情诗,而“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删也”[7](p.525)。既然已有诗坛大家朱彝尊不删《风怀二百韵》在先,自可有袁枚不删缘情之作于后。由此可知袁枚之赞赏朱氏是为自己倡导诗写艳情作铺垫的。

## 二、批评查慎行

继朱彝尊之后,真正扭转诗坛宗唐之风而以学宋为主的是浙派重镇查慎行。查慎行(1650-

1727)初名嗣璜,字夏重,号他山,40岁时改今名,字悔馮,号初白、查田,又取苏轼诗“僧卧一庵初白头”之意,自号初白庵主人。海宁(今属浙江)人。朱彝尊为其中表兄。受前贤钱谦益,老师黄宗羲、钱澄之,以及晚年朱彝尊等的影响,查慎行于宋诗情有独钟,但并不排斥唐诗,故《吴门喜晤梁药亭》诗有“三唐两宋须互参”之句,沈廷芳则评其诗“汇韩、白、苏、陆之长,以发挥性灵,海内咸宗之”(《翰林院编修查先生慎行行状》)[4](p.3245)。这种比较圆通的诗学观,与袁枚反对分唐界宋的“性灵说”正相沟通。袁枚之于查慎行有好评,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前提。

袁枚对查慎行的批评文字虽然不多,但都与其“性灵说”内涵密切相关,或者说足以为其“性灵说”张目。袁枚的批评文字一是推崇查诗的白描手法,二是赞同查慎行的一段诗论。

袁枚于《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其五专论查他山云:

他山书史腹便便,每到吟诗尽弃捐。

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 [5](p.594)

此诗首先肯定查氏乃满腹书史的博学者,如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查慎行本传所称,查氏学问浑灏,“深沉好古,于书无所不窥”[4](p.3246)。这是查氏采用“白描”手法的学问根柢,说明“白描”与寒俭无学无涉。白描的关键是创作时要捐弃“书史”,不要于诗中堆砌典故。关于尾句含义,袁枚有一段话可作注解:“查他山先生诗,以白描擅长,将诗比画,其宋之李伯时乎?”[1](p.249)北宋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擅长以线描勾画物像、不着色彩的画法,谓之“白描”。赵翼《瓠北诗话》卷一〇也称查氏“专用白描”。关于“白描”,鲁迅《作文秘诀》尝予阐释:“‘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其所谓之“白描”与袁枚之“白描”意思不尽同,但基本精神一致,即以简练朴素的文字,真实地表现出形象的生动神韵来。而袁枚之“白描”还特别强调避免“读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1](p.605)之弊。这也是查氏本人的观点,其《东木与楚望叠鱼字凡七章……》其二云:“诗成说用白描法,免得人讥獭祭鱼”,可证。如果说“一味白描神活现”句对白描的妙处说得还较虚,那么,袁枚于《答李少鹤书》中为查慎行辩护时则有更明确的揭示:

足下不喜查他山,以为卑靡之习,自他山开之,此言又误矣!夫他山诗以前之卑靡者,无万万数,不过不传于世,故足下未见耳,非自他山滥觞。他山是白描高手,一片性灵,痛洗阮亭敷衍之病,此境谈何容易! [6](p.170)

所谓查慎行诗“卑靡之习”,当指其诗有《妓席》《憶妓》《香奁》诸作,但后悉删去之。对此袁枚并未争辩,但断然否认此习“自他山开之”,李少鹤属孤陋寡闻,不必大惊小怪。袁枚强调的是查氏乃“白描高手”,故有益于抒写性灵,清除了王士禛诗性情不真之弊,从而达到诗歌的高境界。此乃袁枚推崇查氏“白描”的关键所在。

此外,袁枚于《随园诗话》卷四郑重其事地转引查慎行一段论诗语,这也是对查氏诗论肯定性的评价:“(查宣门)先生有《莲塘诗话》,载初白老人作诗法云:‘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句,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妙不在浅。’其言颇与吾意相合,特录之。”[1](p.127)按所谓《莲塘诗话》系《莲坡诗话》之误,乃查宣门族人查为仁所著。查为仁(1693-1749)字心谷,号莲坡,曾从其伯父查慎行学。其诗话乃以其号命名。袁枚之抄录与今见《清诗话》本略有出入,后者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但两者意思并无大异。袁枚认为查慎行语与其意“相合”,足以与其“性灵说”相发明,这是袁枚重视此段论诗语的原因。其“相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崇意,即重视诗歌表现性情或曰抒写性灵,而反对炫耀辞采、偏重形式。袁枚亦云:“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故反对“多辞寡意”(《续诗品·崇意》诗)[5](p.415)。二是理气,强调诗人创作构思时首先要具备“气”,即旺盛的精神,处于最佳的思维状态,而不是先考虑遣词造句。袁枚《理气》诗亦云:“吹气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盘旋,总在笔先。

汤汤来潮,缕缕腾烟。有馀于物,物自浮焉。”(《续诗品》诗)[5](p.416)即强调“气盛言宜”之旨,而气盛则诗雄。三是虚空,即诗之意象空灵、超脱,留出读者想像的艺术空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袁枚亦云:“离之愈远,即之弥工”(《续诗品·空行》诗)[5](p.419)。四是平淡,即以自然朴素的语言表达至深之情。但平淡不是肤浅,而是袁枚所崇尚的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1](p.262),文字“无斧凿痕”[1](p.169),宛如天籁。由上述可见,查慎行诗白描手法及论诗之语,皆与袁枚“性灵说”中观点合若符契,精神一致。故袁枚乃借查氏之诗与诗论作为自己“性灵说”观点的有力支柱,以使“性灵说”立于不败之地。

### 三、批评厉鹗

浙派真正的代表人物是厉鹗(1692-1752),字太鸿,一字雄飞,号樊榭,又号南湖花隐、西溪渔者,杭州(今属浙江)人。出身寒门,一生布衣,性情耿介,不谐于俗。但自幼好学,学问淹洽,尤熟两宋典故,人无敢难者,其所撰《宋诗纪事》《辽史拾遗》等极为详洽,乃其广博学问的结晶。

厉鹗的诗学观:一是于诗持通变发展的观点,反对沈德潜继承明七子余风,恪守盛唐格调,不知通变,所谓“祖北地(按:李梦阳)、济南(按:李攀龙)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懒园诗钞序》)[8](p.734);而主张“绝去切拟,冥心独造”(《盘西纪游集序》)[8](p.751)。二是于诗之意境风格标兴“清”,称“盖自庙廊风谕以及山泽之臞所吟谣,未有不至于清而可以言诗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双清阁诗集序》)[8](p.737)。所谓“清”是指诗思的清深恬淡,诗境的清幽冷峭,语言的清雅清新。三是于诗重视学问,《绿杉野屋集序》称“书,诗材也”,“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8](p.734),这与浙派开山朱彝尊《鹄华山人诗集序》关于学问可“资以为诗材”的观点同出一辙。厉氏诗之重学问突出表现为“好用说部丛中琐屑生僻典故,尤好使宋以后事”,以及“冷峭字面”、“别名、小名、替代字、方言、工谚之类”,“意谓另开蹊径,色泽新颖别致”[9](p.2369)。

袁枚对厉鹗的批评褒多贬少,其《仿元遗山论诗》论“厉樊榭”云:

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出新裁。

幽怀妙笔风人旨,浙派如何学得来?[5](p.595)

此诗对厉鹗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嫌,可见袁枚对厉鹗在总体上予以赞赏肯定的态度。首句称其诗才全面,兼具《大雅》《小雅》,次句称其用典“另开蹊径”,第三句称其诗表达幽深情思,第四句则把厉鹗与浙派末流区分开来,后者把厉诗弊病推向极端,是其自身的责任。具体而言,袁枚于厉鹗近体诗评价颇高。表现在一是一再称“其近体清妙,于近今少偶”(《答沈大宗伯论诗书》)[7](p.283),“然近体清妙,至今为浙派者,谁能及之”[1](p.796)?“清妙”是厉鹗近体诗的主体风格,即清新平淡,不卖弄辞藻,以抒发其幽怀清思,此与袁枚论诗主“下语要平淡”相通。为此,袁枚举厉诗句为证:“如:‘身披絮帽寒犹薄,才上篮舆趣便生。’‘压枝梅子多难数,过雨杨花贴地飞。’‘白日如年娱我老,绿阴似水送春归。’《人都会试途中除夕》云:‘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还闻索酒钱。’‘烛为留人迟见跋,鸡防失旦故争先。’皆绝调也。”[1](p.796)从此数例看,皆清新平淡,纯用白描,符合袁枚“性灵说”的审美要求。二是爱其诗言情。《随园诗话》卷一〇云:

余最爱言情之作,读之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厉太鸿送全谢山赴扬州云:“生来僧衲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两点红灯看渐远,暮江惆怅独归时。”[1](p.347)

此诗原名《与谢山偕往广陵予至吴门疾作遽归谢山有诗惜别次韵》,打写与全祖望(字谢山)之友情,前联借助典故愧疚自己因病无法陪同友人至扬州,下联借景抒情,友人船灯渐远而自己独归之景,蕴含着诗人内心孤寂的情怀,皆发自性灵,感人至深,故为论诗主情的袁枚所称道。《随园诗

话》卷一四又选录厉鹗哭月上七律四首，作为善于“言情”，“必缠绵宛转，方称合作”之“悼亡诗”的典范[1](p.468)。厉鹗哭月上诗原名《悼亡姬十二首》，袁枚所选为其一、其五、其六、其八。兹摘录其佳句，如：“双桨来时人似玉，一奁去后月如烟”(其一)，“病来倚枕坐秋宵，听彻江城漏点遥”(其五)，“半屏凉影颓低髻，幽径春风曳薄罗”(其六)，“春来憔悴看如此，一卧枫根尚忆不”(其八)？诗前小序称姬人朱氏17岁嫁厉鹗，“姿性明秀”，“喜近笔砚”，又好唐诗；照顾善病厉氏亦甚谨。后因患病“为庸医所误，沉绵半载”，“泊然而化，年仅二十有四，竟无子”。厉氏“悲逝者之不作，伤老境之无惊。爰写长谣，以摅幽恨”。诗皆发自肺腑的情至之语，确属袁枚所誉之“言情绝调”。袁枚为此认为：“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笔能刚而不能柔也。阮亭之悼亡妾，浮言满纸，词太文而意转隐故也。近时杭堇甫太史悼亡妾诗，远不如樊榭先生。”[1](p.469)以苏轼、王士禛、杭世骏等诸大家名家作为厉诗之反衬，可见袁枚对善于“言情”之厉鹗特示青睐。

袁枚对厉鹗诗惟一的批评是其好用僻典替字，如云：“……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诗。樊榭短于五七古，凡集中此体，数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气……”(《答沈大宗伯论诗书》)[7](p.283)又云：

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类《庶物异名疏》《清异录》二种。董竹枝云：“偷将冷字骗商人。”责之是也。不知先生之诗，佳处全不在是。嗣后学者……味同嚼蜡。[1](p.309)

关于替代字，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曾指出：“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按：周邦彦)《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按：吴文英)以下则用代字更多……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沈伯时(按：沈义夫)《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事。’若惟恐人不用替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10](pp.206-207)可见，诗词好用替代字确实“始于宋人”。这其实是一种喜用冷僻典故的恶习，如同类书，其危害则使诗词“索索然寡真气”，无法感人。但袁枚对厉鹗的批评比较宛转，厉氏虽“好用替代字”，“数典而已”，但不掩其诗之另有“佳处”。袁枚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向其“嗣后学者”变本加厉，把此弊推向“味同嚼蜡”的极致，如“以‘瓶’为‘军持’，‘桥’为‘略笻’，‘箸’为‘挾提’，‘棉’为‘芮温’”[1](p.309)之类，乃是故意设置阅读障碍，造成“隔”的后果，使人无法卒读。这显然与袁枚“性灵说”反对征书用典，主张白描、口语化的观点相悖，故为袁枚深恶痛绝，讥为“若辈乃皮傅残宋，弃鱼菽而啖稀苓，尤无谓也”(《万柘坡诗集跋》)[7](p.201)。

### 参 考 文 献

- [1] 袁枚. 随园诗话[A]. 袁枚. 袁枚全集[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2] 洪亮吉. 北江诗话[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3] 袁枚. 小仓山房外集[A]. 袁枚. 袁枚全集[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4] 钱仲联. 清诗纪事·康熙卷[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5] 袁枚. 小仓山房诗集[A]. 袁枚. 袁枚全集[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6] 袁枚. 小仓山房尺牍[A]. 袁枚. 袁枚全集[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7] 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A]. 袁枚. 袁枚全集[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8] 厉鹗. 樊榭山房集[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9] 朱庭珍. 筱园诗话[A]. 清诗话续编[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0] 况周颐, 王国维.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责任编辑 徐 枫]

## Yuan Mei's Critic Comments on the Zhejiang School

WANG Ying-zh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Xingling(intelligence)Theory as the criterion, Yuan Mei made comments on the ZheJiang School's representative figures — Zhu Yizun, Zha Shenxing and Li E —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Kangxi and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He advocated the theory by affirming what was in agreement with it and dismissing what was in disagreement with it.

**Key words:** Yuan Mei; Zhejiang School; Xingling Theory; Zhu Yizun; Zha Shenxing; Li E

##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出版

由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主编、王英志编审策划编辑的《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已于2001年9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明清以前的散文自明代古文家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后，妙笔千秋垂典范，影响十分深远。继“唐宋八大家”后，又有李祖陶所谓“金元明八大家”之目，但流行不广，问津者寥寥。今《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的出版，不仅与“唐宋八大家”相呼应，从总体上反映了明清主要散文大家的创作成就，而且适应了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了解明清散文的客观需求，开拓了读者眼界，填补了市场空白。

该丛书的编选者、策划者长期致力于中国明清文学的研究，深得其中奥妙，斩获甚多。所斟酌确定的明清八大家人选，分别为明代刘基、归有光、王世贞，清代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曾国藩，所选当否或各有所见，但此八大家的散文创作毕竟基本代表了明代不同时期不同文派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明清两代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在编撰体例上，一家一册，分别遴选出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作品，少则五十余篇，多至百余篇。每册书都有前言，用以介绍作家生平、思想和散文成就；每篇选文还分别予以“题解”、“注释”、“评点”，以便读者理解选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书末则均附录作者的传记及有关的评论资料，以及主要参考文献等，供读者深入研究时参考。

总之，该丛书的选注与评点力求具有权威性、科学性，以成一家之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后继明清八巨子，文采两代显风流”，《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明清散文研究工作的深入，而且对明清散文的考释与整理也具有一定的补白作用。

(舒文)